

外贸体制与 国际贸易波动

——加入

WTO

前

中国外贸政策效果评析

马晓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外贸体制与 国际贸易波动

——加入WTO前中国外贸政策效果评析

马晓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到加入 WTO 以前的中国外贸政策进行了系统回顾,在此基础上,运用国际上先进的动态宏观经济理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波动进行了定量分析与检验。

本书适合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研究者作为参考用书,也可供贸易政策决策者阅读。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贸体制与国际贸易波动——加入 WTO 前中国外贸政策效果评析/马晓野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ISBN 7-302-07448-8

I. 外… II. 马… III. ①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中国 ②对外贸易—经济波动—研究—中国 IV. 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379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 编: 100084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刘 昱

封面设计: 孟繁聪

版式设计: 刘祎森

印 装 者: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48×210 印张: 7.125 字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7448-8/F·644

印 数: 1~3000

定 价: 11.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62770175-3103 或 (010) 62795704

序

PREFACE

马晓野博士的新著《外贸体制与国际贸易波动——加入 WTO 前中国外贸政策效果评析》是一本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外贸波动的专著。这本著作的基础是晓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苦读四年所写的博士论文。作为他的导师，我衷心祝贺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贸易发展进程可谓是近代史上的奇迹。从 1978 年到 2002 年短短 24 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扩大了将近 30 倍，年平均增长率接近 16%。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与此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波动幅度亦是很大的：同期的出口年增长率可以高到 32%，低到 -0.4%，进口波动幅度更大，起伏在 54% 和 -12.4% 之间。如果按季度数据分析的话，这种波动状况则更加明显。

中国的外贸发展为什么如此迅速却又如此不稳定？这是一个似乎不难回答但又很难说清的问题。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因素很多，通常包括本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 GDP 增长率，各国价格水平的变动和汇率的升贬，这些都是研究一国贸易波动的主要变量。然而，影响这些变量的因素又是什么？除了这些变量以外，造成中国外贸波动的其他因素又有哪些？马晓野的论著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与通常研究国际贸易的方法不同,作者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动作为分析中国贸易波动的重要变量。这一点,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中国过去 20 多年改革开放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对所研究问题的把握。在大多数研究发达国家贸易的理论和实证文章中,学者们很少使用政策变量。其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贸易政策是基本定型的和稳定的。贸易政策虽有一些变化,但变动不大。因此,在发达国家中,影响贸易的主要是一些基本的宏观经济变量,如价格,汇率等,体制和政策的变量不是主要的。中国加入 WTO 以前的情形则相当不同。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不断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在外贸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仍然很大,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能力仍然很强,政治因素和政策变动对宏观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就不能不重视这些体制和政策方面的作用。另外,过去 20 多年内,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外贸政策的变动方向也并非一致。政府财政税收方面的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变动经常会直接地影响企业进出口的积极性,从而引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波动。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引入宏观和外贸政策变量和体制变动,是本书分析中国贸易波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问题的正确方法。

作者关于中国外贸波动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使用了动态均衡模型。与汇率和价格的影响相比,政策和体制变革对外贸产生影响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外贸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从最初的国家完全垄断到下放外贸经营权,再到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与国际市场接轨为导向的改革。每一次体制变革都带来了外贸企业行为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反映到进出口方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当然,国际利率水平的变化,实际汇率的变化,以及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变动都会对外贸有短期和长期(或称当期和持久)的冲击。要想较准确而全面地研究这些变动对外贸的影响,人们不得不使用动态总体均衡分

析。当然,从技术上说,要想这样做是很难的,但在本书中作者作了很好的尝试。

本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使用了结构向量自回归 (Structure Vector Autoregression, SVAR) 的动态计量分析工具。与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单一方程多元回归或联立方程回归方法相比,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没有明确地限定变量之间的单一因果关系,而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尽管在理论模型中我们能够明确地刻画出进出口与其他各种经济政策之间的结构关系,但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很难从数据中分离各种因素,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已经包含了贸易与这些经济和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有助于识别和分解数据中的“噪声”,从而较为准确地找出各种变量的主要变化特征和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

作者曾长期在海关和外经贸部工作,对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贸易政策的变动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有深切了解和亲身感受。本书中,他收集了大量的文件资料,结合自己的经验,对中国近 50 年来的外贸政策进行了梳理和综述,为读者研究中国近代国际贸易发展和贸易政策提供了许多独到的分析。应该说,这是一本研究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发展的很有价值的专著。本书的出版正是作者勤于学术研究精神和严谨治学态度的充分体现,希望能对有志于从事或正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的同志和同学有所帮助。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海闻

2003 年 9 月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WTO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中国的国际贸易体制及贸易政策 1

回顾(1949—2000 年)

- 3 第一节 实行统制贸易政策(1949—1953 年)
- 4 第二节 计划经济时期实物交换、调剂余缺理论指导下的
外经贸政策(1953—1979 年)
- 13 第三节 改革开放与外经贸政策的变化(1980—2000 年)
- 16 第四节 体制改革与政策设计
- 18 第五节 宏观改革
- 35 第六节 微观改革

第二章 经济转轨与开放过程中对经常账户 45 的管理

- 45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47 第二节 宏观经济波动与中国国际贸易
- 48 第三节 经常性账户的管理政策
- 53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的若干经验

第三章 中国的国际贸易波动初步分析 55 (1980—2000 年)

- 56 第一节 贸易波动的基本性质
- 57 第二节 对进出口波动的经济学阐释

Ack 76/05

59	第三节	进出口贸易的波动特征及其体制根源
64	第四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贸易波动(1979—1984年)
74	第五节	1986年中国国际贸易开始剧烈波动前的高涨期及其原因分析
76	第六节	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轮“三年承包期”间,贸易波动的经济和政策原因分析(1986—1989年)
80	第七节	治理整顿与经济复苏(1990—1993年)
84	第八节	1994年以取消外汇双轨制为中心的改革对贸易的影响
86	第九节	宏观经济的软着陆(1995—1996年)
88	第十节	通货紧缩和“双顺差”对贸易波动的影响
90	第十一节	小结

第四章 国际贸易波动分析的论文文献回顾 93

93	第一节	单方程估计方法
97	第二节	结构模型估计方法
101	第三节	Obstfeld-Rogoff 模型
104	第四节	Kraay-Ventura 模型
106	第五节	Prasad 模型
108	第六节	简要评论

第五章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111

111	第一节	局部均衡分析
114	第二节	一般均衡分析
119	第三节	连续时间动态系统中的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

第六章 中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实证分析 127

127	第一节	导论
-----	-----	----

128	第二节	SVAR 模型的识别与噪声分解
133	第三节	扩展的 Prasad 模型及其计量设定
137	第四节	数据
138	第五节	实证结果
180	第六节	结论

第七章 结语 183

附表 195

195	附表 1	中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因素分析之一
196	附表 2	中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因素分析之二

附图 199

199	附图 1	1952—1997 年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单位:亿美元,当期价)
199	附图 2	1952—1997 年中国的国际贸易占 GDP 比重(按当期人民币价格计算)
200	附图 3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
201	附图 4	1986—2000 年中国出口季度增长情况(以美元计)
202	附图 5	1986—2000 年中国进口季度增长情况(以美元计)

参考文献 203

第一章

Chapter

中国的国际贸易体制及贸易政策回顾(1949—2000年)

本章内容提要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的外经贸政策随着各时期情况的不同,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时期制定政策的依据,主要是当时的国内经济情况和外部环境。一定时期政策的合理性如果只以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评估,则会限制我们的思想。本章从历史回顾出发,试图从国际经济通行的理论角度探讨不同时期政策与理论的关系,并加以总结。总结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我们认为贸易体制和贸易政策的变化是理解贸易波动的关键。

为了分析的方便,本章将外经贸政策回顾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统制贸易阶段(1949—1953年);二,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9年)。需要说明的是,建国以来,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变化很大,这对外经贸政策阶段的划分也有很大影响。本研究不按外部环境的变化划分阶段,但也充分考虑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内部考虑一直是主要的

决策因素,这也符合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相对封闭的特点。因此,外部环境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与制约将在每一阶段的讨论中论及,而不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还需要说明的是,一些政策手段如汇率、计划等是跨阶段使用的,对这些跨阶段的政策手段,也将在讨论波动时涉及。这里,我们先讨论1949年到1979年的具体情况。在这一时期,计划经济是贸易政策的实施基础,所以在分析中我们采用“贸易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效果”三段式的直接分析方法。

从第三节起,讨论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1979年起,中国对外贸易在波动中发展很快。1980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81.2亿美元。到2000年,出口总额增加到2492.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4.6%,比同期9.7%的GDP增长率高出4.8%。出口总量上升的同时,出口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0年商品出口中,初级产品为91.14亿美元,占50.3%,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为90.5亿美元,占49.7%。到1999年,初级产品出口的绝对额仅仅增长到199.41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下降到10.2%。而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则增长为1749.9亿美元,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重增加到89.8%。制成品的出口额在1980年至1999年间年均增长16.9%。这个增长率比同期GDP和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率分别高出7.2%和3.6%。

通过对导致中国贸易波动的特殊现象的政策因素进行回顾分析,我们可以对各种政策手段的效用进行评估,并尝试着构筑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经济体制改革和外经贸体制的改革中的目标转向、计划改革、放开经营、兴办特区、开展加工贸易、吸引外资、融资体制、税制改革、外汇体制的改革以及公司经营财务改革等,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程度影响了对外贸易的表现。

第一节 实行统制贸易政策(1949—1953年)

建国以后,直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国民经济转入单一计划经济轨道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一直处在摸索过程中。当时对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受到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安全、外交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

政治上,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而半殖民地状态中显著特征之一,是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的畸形状态——海关大权旁落,政府对关税税率制定和关税收入不能自主,外国在华自由经商。而且建国前解放区分区割据形成了全国“分区立法,分散管理”^①状态。面对这种情况,实行统制贸易,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新中国政府必然的政治选择。

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由于朝鲜战争,西方各国联合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空间过于狭窄。

在经济方面,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任务极重。这使得对外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适应战时经济的特点。当时的对外贸易要着重配合对外斗争。

鉴于上述客观环境,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目标是建立高度集中的进口行政管理体制。为此目的,中国于1950年12月颁布了《对外贸易暂行管理条例》,后来又颁布了《暂行海关法》,并对审批登记各类对外贸易企业和外商机构、实行进出口商品分类管理、推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管制外汇及审核进出口价格等作了统一规定。这些规定适用于外国在华的540多家进出口公司和国内4600余家私营进出口商。

^① 沈觉人,卢世光,朱昂等.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为了达到对外实行统制贸易,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对内节制资本,经济上自力更生等政策目标,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管理上配合以对私营进出口商的使用外汇、经营范围和信贷等进行限制等政策手段,达到了对私营进出口商的限制、利用、改造,并逐步予以替代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实行迅速地扭转了建国前对外贸易的长期逆差状态,也为在对外贸易行业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它适应了建国初期的政治、外交、安全和战时经济的特点和要求,以保护贸易为目标,以统制贸易和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辅之以高额进口关税,达到了平衡进出口的目的。三年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30%,扭转了旧中国长期贸易逆差的状况。

第二节 计划经济时期实物交换、调剂余缺理论指导下的外贸政策(1953—1979年)

从 1950 年起,中国经济生活中两件大事对对外贸易政策起了根本性的影响。第一件事是中国按照当时的情况作出了发展战略方面的重大选择;第二件事是中国开始从 1953 年起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全部国民经济纳入到单一的计划经济轨道。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对出口创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增加了中国领导人更快地发展经济的信心,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坚持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适应战时需要的半军事化的经济管理体系,为进一步集中调动各种资源向重工业倾斜,实现“赶超战

略”^①提供了可能。参照前苏联等国的经验,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

从建国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从前苏联得到 11 笔贷款。中国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实施了 156 个建设项目,同时上马的还有 694 个工业建设项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对外经济合作。由于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许多机械设备和生产用原材料都要进口,对外贸易政策必须配合国内工业建设和对苏经济合作。通过发展出口贸易提高支付能力是当时主要的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之一。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进口商品结构配合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进口总额中,生产资料约占 91.5%。生产资料中的资本货物约占 51%,工业原材料约占 36.5%,农用生产物资约占 40%。全面向工业建设倾斜的经济战略与中国社会当时的经济结构之间有着诸多的不适应之处,因而,通过对外贸易环节平衡经济循环的内生矛盾这一任务很重。全面向工业建设倾斜的战略不仅加深了经济结构的矛盾,而且产生了新的矛盾。这种超越客观情况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实践中难以长期推行,随着矛盾的积累和爆发,对外贸易也终于不堪重负。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压抑了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与消费,可供出口的货源急剧减少,参见表 1-1。

表 1-1 中国对外贸易收购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

年 份	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	外贸收购总额 (亿元)	外贸收购总额占工 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比上年增加(%)	外贸收购总额 占工农业总产 值的比重(%)
1955	1109	37.42	43.3	3.4
1956	1252	47.08	25.8	3.8
1957	1241	54.07	14.8	4.4

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续表

年 份	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	外贸收购总额 (亿元)	外贸收购总额占工 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比上年增加(%)	外贸收购总额 占工农业总产 值的比重(%)
1958	1649	89.65	65.8	5.4
1959	1980	102.26	14.1	5.2
1960	2094	85.34	-16.5	4.1
1961	1621	70.2	-17.6	4.3

资料来源：《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实物计划指标成为开展进出口贸易的依据

传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中，涉及对外贸易理论之处不多。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重视物质生产，甚至更有一种思想认为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只是分享物质生产部门创造出的价值，对外贸易这一流通环节只是一种辅助生产的手段。

从1953年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全部经济纳入计划经济轨道，中国在制订经济计划时，基本目标是要实现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而平衡的中心点和出发点是物质生产指标。制订计划的方式基本上是把最基本产品(如煤、钢、粮食)的实物生产指标进行行业分解，并逐级分解到基层生产单位。在分解过程中，对无法在国内生产中满足供给的部分，则要求通过进口贸易予以平衡。对外贸易计划的作用是“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求，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① 对外贸易是衔接及补足第一部类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缺口的一个外延环节。基于上述情况，对外贸易计划是逐项商品制订的。

进口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按商品逐一制订，它包括进口具体数量、金额和到达口岸。出口则由对外贸易部按具体商品制订收购

^① 房维忠. 中国的计划经济问题. 北京: 计划出版社, 1983

计划,商品无论大小,没列入计划就拿不到货源,按公司和出口口岸制订出口品种、数量、金额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商品调拨计划。

以实物指标为核心的对外贸易计划是计划经济对国外市场的延伸,在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制约下,实行初级生活用品进口替代和次级机械、设备进口替代,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目标是通过配合引进 156 项工业建设项目,来支持国家发展战略,而出口创汇是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中的重中之重。^① 这一时期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手段配合上述政策目标,其中主要是由对外贸易部负责通过行政管理、计划、经营三位一体的方式,保证目标的实施。

1953 年,中央政府和对外贸易部制定了一系列的进出口行政管理规定。其中,规定了经营进出口业务厂商和外商要进行登记;将进出口商品分为四类,严格按照商品范围,区分企业的公私性质;分别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许可证审批权限。^② 1953 年 1 月 9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166 次政务会议决定,将海关与外贸管理机关合并,将行政与执法机关划一。1956 年,由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的对外贸易业务开始全部由对外贸易部领导的国营进出口公司经营。几乎同时,对外贸易全部被纳入了国家的计划管理。在财务管理体制方面,则由对外贸易部部一级统一核算和综合平衡盈利及亏损,并由财政部统收统支,统负盈亏。至此,管理者、计划制订和执行者、经营者三个职能都集中于对外贸易部一身。而在资金方面,尽管后来取消了建国初期的中央一级财政的贸易金库和“大回笼”^③的做法,将贷款权下放到公司,但是仍然实行按商品收购计划对资金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当时制定了相应的外汇管理办法,但外汇审批的依据仍然是许可证和计划。

① 沈觉人,卢世光,朱昂等.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② 沈觉人,卢世光,朱昂等.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③ 沈觉人,卢世光,朱昂等.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上述这些政策手段使对外贸易的集中与垄断程度符合了制定政策者的理想。但是,政策手段的完备不能弥补政策目标和发展战略脱离经济实际的缺陷,随着经济失衡必然导致政策调整。

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陷入严重的比例失调。外贸进出口额处于衔接及补足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缺口的夹缝,此时经历了三年连续下降,已退回到1954年的水平。1960年,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副总理提出了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建议,指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就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各种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①根据陈云的上述建议,国家对对外贸易计划作了重大调整。进口优先安排的顺序依次改为粮食、化肥、农药、油脂、工业原料、设备。为了保障生活资料的进口,中共中央要求全党紧急动员,各省成立对外贸易指挥部,以运动的方式大抓出口产品收购。当时实行的以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进口为中心,按需安排出口的政策,是在不触动贸易政策理论前提下的权宜之计。但紧急情况下的政策调整使得进出口脱离国内生产的状况大大缓解,效果还是积极的。

随着政策的调整,中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约占60%,工业产值不到40%。但初级产品中的粮油、食品、土畜产品占到了出口的80%。这组数字说明,当时中国在收购生活物资以支付机器设备进口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经过政策调整,到1965年生活资料(主要是粮食)的进口上升为总进口的33.5%(1953年为7.9%)。对外贸易政策这次由出口为中心转到进口为中心的大方向调整,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衡的状况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

① 沈觉人,卢世光,朱昂等.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